

以“乡土”为方法： 区域史研究如何重构近代视野

——王杰《乡土与世界：香山文化的近代视野》读后

□郭跃文

地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承载着一方水土的历史记忆与精神特质。岭南大地文脉悠长，香山文化作为岭南文化极具特色的支脉，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独树一帜，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敢为人先的勇气，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文化样本，其孕育的先贤群体与精神内核，更是近代中国不懈追求独立、民主、富强的生动缩影。

“香山文化”何以重要？为何这一隅之地，在近代中国能一跃成为连接世界的重要枢纽？香山，地处珠江口西岸，历史上辖境曾涵盖今中山市、珠海市及澳门一带。自明中叶葡萄牙人强行租占澳门以来，这一区域持续处于中西交通的前沿，商贸、传教、留学与移民往来频仍，使其社会结构与文化气质，较之内陆地区更早发生转变。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王杰先生的新著《乡土与世界：香山文化的近代视野》（以下简称《乡土与世界》），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正可作为对这一历史的系统梳理与深入阐释。该书并未止步于对区域文化的描述，而是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一个地方，如何在与世界的持续接触中，改变自身，并反过来影响更大的历史进程。全书收录论文24篇，从概说、特色、事典、先贤四个层面展开。其内在路径，是以“乡土”为入口，通过具体的人物行动与制度事典，层层铺展，最终落在近代中国如何在地方经验中逐渐形成面向世界的认知与实践这一历史过程之上。

王杰深耕史学研究五十余载，潜心孙中山研究和香山文化研究，笔耕不辍，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多项重大课题，在史学界享有盛誉。其治学秉持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优良传统，恪守“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精神。正因有这样一层扎实的功夫作底，这部汇集作者二十余年香山文化研究成果的著作，得以在具体史实之上，展开更开阔视野，将香山置于中国近代化与世界文明交流的背景之中加以考察。



容闳和唐廷枢（左侍柱者）合影 图片由宾睦新先生提供

一种研究范式： 从“乡土”进入“世界”

地域文化研究常面临一道难题，即如何从具体的地方经验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命题，而不止步于地方性知识的简单汇编。《乡土与世界》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提供了一种将“乡土”与“世界”进行关联性考察的研究范式。香山地处中国大陆南端，因盛产桂香得名，是中国海路与西方接触最早的区域之一。作者跳出地域文化研究的视角，将香山文化放在全球化与地方性、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双重维度下审视，正如作者所言：“本书切入香山文化与世界互动的轨迹，可以喻为在香山发现世界、按图索骥者，从香山文化中寻找近代世界的声波与印痕。”全书以“乡土世界”为引，使研究超越地域界限。

书中提供了翔实的例证，使这一视野落地生根。自明中叶以降，香山人与海外形成持续联系。例如，书中对香山留美幼童群体的量化分析极具说服力：

1872至1875年间，清政府派遣的120名官费留美幼童中，香山籍占39人，另有自费随同越洋留学11人。这一比例之高，直观揭示了香山如何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形成面向世界的知识接触通道。

《乡土与世界》呈现了香山“面向世界”的具体历史过程：当“世界”以贸易、宗教、教育等多种路径持续进入地方社会之后，这一地方的观念、制度与人群结构是如何随之发生联动与变化，并逐步生成新的行动能力。

由“事典”入手： 制度与资本的微观运作

史学研究，史料为基、考据为要。《乡土与世界》的另一大底色，在于其史料宏富与论述精辟。作者爬梳剔抉，广泛征引档案文献、近代报刊、时人著述、方志族谱等第一手史料，为论述提供了坚实支撑。

书中对香洲开埠、招商局发展等事典的探讨，对海洋文化、买办文化的剖析，俱非空泛的理论推演，而是立足于

对具体史料的深度解读。在剖析香洲商埠迅速衰落的因由时，作者不囿于成说，对前人所持的“地势”“天灾”“内耗”或笼统的“缺乏政府支持”等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其衰落是官督失位形成的“压迫力”与商办自身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书中指出，新政时期官方对商业的主导作用十分关键，而朝廷无暇旁顾、各部权限牵制、地方官员心猿意马，致无税口岸审批迟滞，商埠也始终缺失官助资金；商办资本单薄、集资受阻，自救策略皆遭阻，又与地方势力起利益纷争，官督商办的矛盾难以调和，最终令商埠迅速衰落。

作者对“香山三杰”唐廷枢、徐润、郑观应文化表现亦作出精准概括：“一是扭转传统‘商人’的社会价值观念；二是呼唤济世忧民，倾力扶贫济困，舒缓民生；三是倡行办报，为广东、为中国的智慧、文明发声；四是立足启蒙……勇立潮头，争做先锋。”短短数语，鞭辟入里地揭示出香山先贤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先锋作用。

书中亦不乏有细节的呈现，使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相映照。例如，作者写道：“他（唐廷枢）激情满怀，以办好轮船招商局为己任，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殚尽所能……其实，唐廷枢爽快受命，乃是缘于一颗炽热的中国心，一根不屈的民族脊梁。他说：‘以本国之船，装本国之货，系本分之事，岂容外人覬覦。凡有血气者，莫不以父母之邦，自办轮船，为虑远谋深之策。’他供职怡和洋行期间，就力促加大投资航运力度。如今，走马上任，既看好轮船招商局乃一个即将崛起的新兴企业，又可以施展昔年建设航运的抱负。甚者，这既是与洋人争经济利权，更是争民族平等权益，为中国尊严而战，何等扬眉吐气！”

文辞与史识的辉映： 学术表达的一种可能

优秀的史学论作，既要有严谨的学术内核，也要有生动的文字表达。在《乡土与世界》中，论者兼具史家的严谨与文人的才情，文字雅洁凝练，叙事生动鲜活，字里行间尽显对香山文化与先贤的温情与敬意。他写道：“买办是香山的特产，在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瞬息万变的百年行程中，他们弄潮于时代，风骚一时，功名遐逝，功勋垂世，曾作为香山的代名词。”又言：“近代香山，借澳门之地利，得西学之先风，哺人才辈出，

领华夏风骚。”

写容闳，则不满足于罗列其促成幼童留美的功绩，而以其拒绝以传教士身份换取奖学金时的一段自白为支点对“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由此勾勒出一个终生不渝的爱国者形象。写郑观应，作者紧扣其“西学中解”集大成者的时代定位，将《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二十余载三易其名的过程串联起来，深刻揭示其“立言之艰险，担当之坚韧、发蒙之雷动、事功之卓著”。

这些文字之见功力，不在辞采斐然，而在分寸感极强。它并未离开材料自说自话，而多是在史料铺陈之后，顺势收束、略作点醒——既不回避历史的复杂，也不放任议论的泛滥。于是，论述既有根柢，又有温度，既能立足于证据之上，也能够进入阅读之中。这使得学术著作在保持深度的同时，拥有了进入更广泛读者视野的可能。

《乡土与世界》的出版，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文史研究、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启示。它提示我们，相较于宏观叙事的概括化表达，真正有力的学术研究，往往需要回到具体材料之中，理解地方如何在与世界的互动中生成自身结构。岭南文化是学术研究的富矿，包括香山文化在内的诸多地域文化，其丰富内涵与历史经验仍有待进一步发掘。

香山故事，经久弥香；乡土根脉，联结世界。王杰先生在书中引述马克思的论断——“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这既是全书的史观基石，也恰可作为我们理解香山史观的钥匙。香山先贤并非凭空创造历史，而是在乡土与世界交汇的特定条件下，以“爱国如命、敢为人先”的精神，将一个边陲之地，锻造成为中国近代世界的前沿阵地。《乡土与世界》以扎实的史料工作，还原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发生机理。与其说它提供了一套结论，不如说它开辟了一条路径：从地方出发，重新理解中国如何进入世界，并在此过程中重新认识自身，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研究员）

论梁启超在现代性激荡中的文化身份重构

□谢伊霖

启超，以其思想实践回应了类似的现代性问题。

韦伯之“问”： 儒家如何回应现代性？

今日世界，现代性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论及现代性，马克斯·韦伯曾指出，现代性的本质是“世界的祛魅”——理性化、计算化的现代秩序取代了由神秘性统率的传统世界。问题是，现代性语境下的汉语精神资源如何作出切实的思想回应？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分析，儒家传统强调适应现世，因而未能生成以形式理性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与科层制国家。然而，他的深刻之处在于并未将现代性视为纯粹的西方专利，而是言明不同文明可以进行自我调适。由此，儒家传统并非现代性的天然敌人。

韦伯揭示了“理性铁笼”危机——工具理性泛滥、价值理性衰落——但这一困境恰恰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历史机遇。问题的关键在于，儒家能否在“守护经”与“通达权”之间实现转化：在变通中坚守精神内核，在转化中回应现代性挑战。儒家“经权”思想本身就内含变通的智慧。“经”乃不变的核心价值，“权”为因时制宜的会通方法。这种内蕴辩证思维的传统资源，可让儒家在守护核心价值的同时，灵活调整其落地形式。儒家的现代命运，取决于它能否完成从“适应现世”到“塑造现世”的范式转换，发展出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相契合的新型表达形式。这不但是中国文化的挑战，也是所有传统文明面对现代性时必须解答的普遍命题。

与韦伯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段的梁

梁启超的“回答”： 在“淬厉”与“采补”之间

珠江奔腾入海，潮汐翻涌，孕育出物产丰饶的珠江三角洲。这种咸淡交汇的生态奇观，恰似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保守与激进的近代中国在“西潮”冲击下的文化处境。岭南学者梁启超，以其深邃的文化洞察力，在东西文化激荡之间，努力探求平衡。自古以来，岭南文化就身兼南越文化、中原文化与海外文化于一身，形成了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文化品格。这种地域文化特质，使梁启超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能够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既不固守传统，也不全盘西化，而是在潮汐激荡中，寻找一条既可以守护文化主体性，却又能够革故鼎新并实现创造性转化的道路。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这“淬厉”与“采补”的辩证，构成了他整合传统与现代的核心方法论。这一点也为当今众多学者所肯定并阐述。

在梁启超看来，儒家传统本身就蕴藏着可被激活的现代性资源。“天下”情怀可应对普世伦理的挑战，“仁爱”思想与现代“人权”观念异曲同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可为克服生态危机提供启示，“民胞物与”则对矫正极端个人主义贡献独特价值。这些资源，正是“淬厉其所本有”的对象与起点。

“淬厉其所本有”并非简单的保守传

统，而是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批判性梳理和创造性转化。梁启超先是深入研究墨子学说，发掘其兼爱、非攻思想中的全球伦理；接着重新诠释阳明心学，强调其“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然后再梳理清代学术史，凸显出考据学的深厚学术功底。这种“淬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蒸馏过程，即通过现代性的火的洗礼，以提取传统文化中新的变革精神。

“采补其所本无”则体现了梁启超开放的文化胸怀。流亡日本期间，梁大量学习西方思想，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皆为其重要思想来源。在政治、法理和经济方面，丰富了其国家学说。梁启超的“采补”绝非囫圇吞枣，而是深思熟虑后的会通。“吾国民食其德、饮其报者，必当调剂其间以应时势所需。”师法多元文化，沐浴欧风美雨，但主体身份仍存，因此，要么全盘西化，要么盲目排外，都不是梁启超所欣赏的。在“淬厉”与“采补”的辩证运动中，西方文化是梁启超刺激中国文化的钝锤和利锥。如若说当时中国身处传统与现代这座熔炉的话，那么，梁启超的“淬厉”与“采补”文化自觉意识就是让这座熔炉产生化学反应的催化剂。梁启超的“新民说”，就是一种既不同于纯粹传统，也不同于纯粹外来的新文化化合物。

从理论建构到知行合一

《新民说》系统阐述了塑造现代国民的理论，本质上是对韦伯所言国家理性化过程的回应。梁启超深刻意识到，现代性不仅是器物、制度的变革，更是人的主体性重构。由此，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

步、自尊、合群、生利的能力、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等观念，乃现代性处境中一个完整的现代人之人格系统构成的必不可少因素。这些要素既会通了西方现代价值观，也转化了传统士人的修身理念。不止如此，梁启超还提出“合群”也乃新的重要品质，这既源于传统儒家“群己”观，又融入了西方社会的利他价值理念。他特别重视现代人要通过社会纽带与他人连接而成为公民，这种思想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辩证理解，既有助我们规避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又不落传统中国集体主义对个体埋没的实践窠臼。

梁启超文化整合思想的另一重要维度，是他对线性历史观的突破和对文化时空观的重构。在《新史学》中，他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改造，试图建立一种能够包容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新的历史解释框架。梁启超将历史理解为“一个有机的进化过程，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种进化观并非简单粗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进化论，‘公理公例’的昭昭乃仁心之所发端的结果。

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性的危机进行了反思，看到了单纯的技术进步和物质繁荣并不等同于文明的全面进步。现代性本身包含着深刻的悖论。学习者在真知灼见面前并不需要仰人鼻息，其见解同样可以穿透历史的迷雾而掷地有声，师法而不盲从，由此可窥梁启超的思想睿智和人格独立所在。这种富有入性的历史观，使得梁启超能够超越简单的中西对立和古今对立思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生命游历之旅，使他最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使各民族在差异之中形成更高层次的共同体认同，这本身就

是一个整合传统与现代、本土与普世的伟大尝试。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对传统的各民族文化族群身份的认同，也融入了现代国家建构的要求，因此，它是一个既尊重历史连续性也面向未来开放性的伟大思想观念的创新。

梁启超的文化整合既来自对理论的思考，又来自对生命实践的总结。他的政治活动、教育实践、学术研究，都是其文化理念的具体展开。这种知行合一的品格，既源于阳明心学的传统，也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从公车上书到维新变法，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到参与民国政治，梁启超始终在探索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路径。在此过程中，传统士大夫的济世情怀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并行不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传统理想与现代公共舆论、政党政治等政治实践可相得益彰。他的学术研究同样体现了文化整合之功：《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在运用西方科学方法的基础上继承了中国的考据传统，既体现现代学科的专业性，又保持传统通儒的博雅精神。

梁启超在现代性激荡中整合传统的努力，对我们思考文化转型具有历久弥新的启示。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可以通过创造性诠释实现有机衔接。这种文化整合的智慧，正是岭南文化在现代性激荡中保持身份认同同时又实现创新发展之关键，也是所有传统文明面对现代性挑战时必须解答的普遍命题。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师，此文为“卡理玛玛典型视域下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以梁启超为中心的一个考察”学术项目阶段性成果）

羊城晚报

A6

理论

文史哲

2026年4月24日

星期五

责编 潘玮倩

美编 陈炜

校对 姚毅

